

脆弱性贫困与农村妇女贫困问题 ——基于甘肃省的实证调查

蔡生菊

(中共武威市委党校, 甘肃 武威 733000)

[摘要] 在农村, 妇女是主导家务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 贫困家庭能否顺利脱贫取决于妇女的脱贫程度。农村妇女作为既脆弱又贫困的群体, 她们在应对因生产环境、自然灾害、个体健康、教育程度、家庭环境、政策制度和社会福利等带来的风险时, 由于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手段而容易陷入贫困。以贫困脆弱性为分析视角, 考察贫困妇女现状和成因, 不仅有利于预防和缓解妇女贫困, 还有利于降低贫困家庭继续贫困或返贫的概率, 增强精准扶贫的实效性。

[关键词] 脆弱性贫困; 贫困妇女; 脱贫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566(2017)01-0099-05

一、问题的提出

截至2015年初, 甘肃省尚有417万贫困人口, 占全省农村人口的19.8%。其中, 农村第一、二类低保户有136.9万人, 他们是家中丧失主要劳动力或主要劳动力患重病、有残疾的特困人群, 失去自我发展能力, 属于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中“兜底一批”的对象。这些特困群体因政府兜底而吃穿不愁, 住房和医疗等有了一定保障。除此之外, 在417万贫困人口中还包含着45.8%的贫困妇女, 这个群体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吃穿、住房、看病的困难。与男性相比, 妇女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有限, 陷入贫困的机率高, 属于脆弱性贫困。比如康乐县发生的杨改兰事件, 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个案, 但是它警示我们, 贫困妇女是一个脆弱性群体。她们的脆弱性不仅来自贫困本身, 还有来自家庭关系、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方面存在的风险冲击。随着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妇女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也是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和主导家庭事务的主要力量, 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越来越突出。但是, 家庭和社会对这个群体的重视程度却不高, 她们的婚姻安全得不到保障, 普遍缺乏关爱, 缺乏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深入农村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现象, 很多家庭娶到的儿媳妇常常被别人拐走或离家出走, 留下年幼的子女和因婚欠下的债务, 使好好的家庭蒙受损失而很快陷入贫困。可以说, 妇女是导致家庭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同时也是贫困的直接受害者。立足农村妇女贫困程度深的现状, 如何使强有力的精准扶贫措施对此发挥有效作用, 是精准扶贫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帮助妇女走出脆弱性贫困来缓解长期性贫困的途径之一。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一) 脆弱性贫困的内涵

根据世界银行的界定, 贫困的脆弱性主要指家庭或者个人当前面临的在将来遭遇各种可能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5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调查及精准扶贫效果提升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 YB105) 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6-11-29

[作者简介] 蔡生菊(1976—), 女, 甘肃天祝人, 中共武威市委党校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导致贫困的风险的可能性,包括从不贫困状态进入贫困状态以及继续维持贫困状态(World Bank, 2000)。脆弱性包括群体受到冲击和对抗冲击的实力,两者相比较的结果即脆弱性。所谓脆弱性贫困主要是指穷人由于缺乏抵抗风险的手段,而更容易遭受风险的伤害,这是一种动态的贫困范式^[1]。贫困的脆弱性产生于贫困人口对多种冲击缺乏应对能力,这些冲击包括自然灾害、生产环境、个体健康、教育程度、家庭环境、政策制度、社会福利及经济因素等。社会学家对贫困的定义通常从个体脆弱性的维度进行的,借助能力、谋生、剥夺、排斥等术语描述贫困状态。他们对贫困的定义无意间指向了脆弱性人群,如,处于风险的儿童、女性、老人、残疾人等。将脆弱性纳入贫困的定义显示出,贫困不仅包括物质和健康的缺乏,也包括各种内部、外部条件的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需要区分的是,某个个体脆弱但不一定贫困,而有些个体却是既脆弱又贫困。从贫困实践看,贫困妇女作为贫困者中的贫困者,她们应对外来风险的能力有限,健康和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情感和心理健康承受度低,属于既脆弱又贫困的群体。诸多研究表明,脆弱性贫困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有必要将脆弱性作为帮助贫困妇女的一个分析视角,探寻扶贫机制的局限性,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预防和缓解妇女贫困。

(二) 理论框架

关于脆弱性贫困,阿玛蒂亚·森最早从能力、功能和权利的角度来讨论贫困问题时就指出,不能把贫困看成是收入缺乏或消费水平低下,贫困的实质是人们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抵御各种生产或生活风险、抓住经济机会和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或者他们的能力被剥夺了,无法平等地获取许多公共产品。他认为贫困是因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可行能力是指对于本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因此,能力贫困理论试图通过重建个人能力和创建机会来避免和消除贫困。

(三)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7月—2016年3月甘肃省58个片区贫困县(市、区)、17个插花县(市、区)的6220个贫困村、97万贫困户进行随机抽样后的实证研究。研究中问卷调查是从抽样所得的1387户(5648人)作为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问卷以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收入、住房、教

育、职业、营养、健康、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作为自变量进行测量。研究中还采用了结构式访谈法,访谈对象是L区所有贫困村中抽取的5个村的贫困户家庭妇女。通过深度访谈,获取研究对象的家庭结构、个体特征、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健康状况、家庭医疗保障情况以及对精准扶贫中相关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三、农村贫困妇女的脆弱性表现

(一) 物质贫困——生活状况的不稳定性

1. 妇女收入水平低。对农村家庭来说,打工收入和农业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两大来源(如表2)。以L区为例,人均仅有2亩地,按平均4口之家计算只有8亩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这两年政府推进“主体生产模式”,倡导农户建设日光温室,土地一部分用来建日光温室后所剩无几。中年妇女要照顾孩子和老人而很少有机会外出务工,农业生产经营是农村妇女的唯一收入来源,然而农作物的产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大,具有潜在风险,收入极不稳定。

表1 2015年家庭收入情况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2015年总收入	2000.00	60000.00	19465.5172	11231.39110

表2 家庭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经营收入	48	2.0	2.0	2.0
农业收入	988	40.8	40.8	42.8
救济金	239	9.9	9.9	52.7
打工收入	1068	44.1	44.1	96.8
其他	80	3.2	3.2	100.0
合计	2423	100.0	100.0	

2. 妇女消费有限。调查显示,贫困妇女总体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较低,消费主要是以满足衣、食、住这种基本的生存需求为主。而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当中以家庭日用品和给老人看病买药及孩子上学的费用为主,另外,加上少量的通讯费用和红白事上的礼金,而专门投入到自己身上的费用非常有限,买衣服也是在每年过年的时候才会有。

3. 妇女住房条件较差。住房从整体水平上来说,农村妇女的居住条件非常的不好。她们的居住空间都非常的宽敞,人均住房为2间(约36平米),但是居住条件非常的差。被调查的贫困户中,

表3 消费支出

	支出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住房	32	2.3	2.3	2.3
	饮食	96	6.9	6.9	9.2
	教育	399	28.7	28.7	37.9
	医疗	686	49.4	49.4	87.4
	人情往来	16	1.1	1.1	88.5
	其他	158	11.5	11.5	100.0
	合计	1387	100.0	100.0	

85%的住房都在20年以上。2000年以后修建的房屋结构以砖混为主,而这种房屋所占比例很小,之前的大都为土木或砖木结构的房屋(如表4)。贫困户住房情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住房条件较好的,用积蓄和借来的钱修建起来给儿子娶媳妇用的;另一种情况是住房条件差的,有的是属于爷爷辈修建的,父辈没有能力再修建,至到第三代人、第四代人还在居住。另外,农村妇女居住的房屋和厨房卫生条件普遍比较差。

表4 房屋结构

	房屋结构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土木结构	414	29.9	29.9	29.9
	砖混结构	669	48.3	48.3	78.2
	钢筋混凝土结构	304	21.8	21.8	100.0
	合计	1387	100.0	100.0	

(二) 能力贫困——对外界环境的应对能力有限

1. 妇女健康程度比男性差。全国妇联针对贫困妇女生存状况调查显示,85%的贫困妇女患有不同疾病,青壮年贫困妇女中患妇科疾病的比例占三分之一以上。从我们的入户访谈中可以证实,营养和卫生知识缺乏使贫困家庭中其成员疾病的发生率高于一般家庭,尤其是妇女的健康状况较差。妇女一方面要务工或农业生产,一方面要做家务、照顾家中老人孩子。她们一天奔忙于家务和农活之间,时间休息不充足,因长时间从事消耗体能的劳动严重的损害了她们自身的身体状况。加上心理等其他因素,致使身体抵抗力下降而容易患病。而患病后,由于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医疗费用,往往出现因病返贫的现象。

2. 贫困妇女劳动技能单一,创业就业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比如在L区推行设施农牧业以来,很多项目的操作是有技术要求的,从种植、施肥、农药、浇水、通风、温度、湿度的控制到采摘、销售都要科学操作和管理,如果管理不善就会导致收益减少和损失,全年收入就会受影响。

(三) 文化和权利贫困——遭受损失后难以复原

1. 妇女文化水平较低。2014年全国妇联针对贫困妇女所做的调查中61.9%的贫困妇女是小学以下学历,其中文盲占18.7%;调查显示,样本中妇女的文化程度小学或文盲、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的比例为71.3%、20.7%、4.6%、1.1%(见表5),没有上过学的妇女是男性的2倍。另有研究证明,受教育水平与经济收入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收入最低的20%的群体中,妇女文盲率为56%,男性文盲率为34%。在收入最高的20%的群体中,妇女文盲率为17%,男性文盲率为6%。

表5 文化程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小学或文盲	985	71.3	72.9	72.9
	初中	287	20.7	21.2	94.1
	高中(含中专)	64	4.6	4.7	98.8
	大学及以上	14	1.1	1.2	100.0
	缺失	322	2.3		
	合计	1387	100.0		

2. 女童失学率较高。来自国家的家庭资料显示农村孩子的失学率是城市孩子的2倍。基于我们的调查分析发现,贫困家庭中的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不长,辍学率较高,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进入高中阶段教育的不到一半。除了高中录取率降低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家庭为她们谋划好了未来的发展,让她们尽快就业,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或者是在家分担家务,让母亲外出打工,以补贴家庭收入。

3. 妇女就业权力保障不足。近年来,农村妇女外出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妇女大多是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偏低,工作不稳定,长期处于变换工作或隐性失业状态。大多外出就业的妇女都属于季节性务工,对就业岗位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非农收入有限,只

能是补贴家用,无力承受较大数目的消费支出。

4. 贫困妇女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机会少。当问及是否参加过职业技术类培训,参加过什么样的职业培训时,大多数妇女的回答是没有参加过职业培训,一般都是家里的男性去参加培训拿个资格证,其中有一些曾经外出打过工的妇女有参加职业培训的经历。据调查,当地妇联组织也经常入村组织一些培训,比如广场舞、产业政策、项目、编织和家庭美德等。但是这些都是些岗前培训,为期一般一周左右,涉及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的内容很少。

四、农村妇女脆弱性贫困的成因

(一) 生产资源不足,收入非常有限

家庭土地少,农业收入有限,不足以形成资本积累,无法扩大再生产。另外,农村集体经济实体没有创建起来,土地经营收入基本没有。加之农村比较封闭,她们与外界的联系不多,缺少相应的各种信息,即使有机会也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家庭状况长期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状态,遇有自然灾害或大的支出项目就陷入贫困。

(二) 社会资源匮乏,改善经济现状的能力不足

贫困妇女社会资源的匮乏,表现在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匮乏,导致她们通过社会联系(社会网络)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较差。加之,性别差异和文化水平偏低,非农就业的机会很少,收入状况不稳定,贫困的脆弱性很高。在生产技能和体能上都较男性弱,生产效率低,收入与男性有较大差异。

(三) 经济基础不牢,抵抗外在风险能力差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导致贫困的外在风险主要来自子女教育、疾病和失败婚姻。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家庭来说,未来可能带来整个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当前的教育投入让很多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很快陷入贫困之中。和因学致贫同样使家庭陷入贫困的还有因病致贫和因婚致贫。

(四) 妇女权益受损,冲击家庭贫困风险多发

农村家庭中但凡有劳动能力的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妇女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有刚结婚的年轻媳妇,也有在家照看孙子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在家中时常总担心家人身体健康、丈夫在外是否安全、是否有外遇、家庭生产经营遇见困难等,造成精神压力

大,缺乏安全感。此外,留守妇女遭受外界干扰较多,家庭婚姻安全缺乏保障,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总之,她们面临的未来潜在风险较大,权益一旦受损就滑入贫困的概率较高。

五、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 生产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权益受损和社会关系是导致农村妇女脆弱性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其中由社会排斥导致的妇女能力脆弱是当前农村长期贫困存在的特征之一。这种脆弱性表现在精神文化、心理素质和权利保障方面。

2. 贫困妇女是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者。由于贫困女性大多在营养健康、医疗保健和教育程度上较为欠缺,她们在贫困中呈现出来的资源短缺、机会缺失、能力不足、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很容易传递到下一代人那里,妇女成为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主要影响者,无形之中影响着家庭脱贫进程。

3. 妇女贫困是发展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妇女问题。将妇女贫困置于一般贫困研究或妇女问题领域,缺少对妇女贫困类型、特征、影响等专门性研究,而这些在妇女贫困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4. 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应包含妇女。从现行的扶贫实践经验可以看出,针对贫困家庭的扶贫方式忽视了妇女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家庭脱贫过程中的边缘人。

六、帮助妇女摆脱脆弱性贫困的未来路径

(一) 完善分性别的贫困监测和评估制度

完善精准扶贫效果评估框架的内容和评估机制,增加分性别监测、评估指标和分析框架。依据目前精准扶贫现状,重新审视有关贫困户的识别指标,特别是有关妇女贫困状况的两项重要指标(妇女长期患病率和女童辍学率),在瞄准贫困户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瞄准到贫困妇女,即贫困中的贫困者,使扶贫对象精准到人,从而保证扶贫措施精准,效果更加稳固。

(二) 提高现有扶贫系统中的社会性别敏感性

在精准扶贫实施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现行扶贫措施及项目,对妇女摆脱贫困有减损的部分做出修改和完善。重点增加对妇女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生产资本等资产占有、控制及使用的项目资源分配权限。扶贫项目的实施中进一步衡量贫困妇女的工作量和角色分工,鼓励并建立男性分担家务及照顾老幼的新社会规范。在劳动技能培训中,考

虑技术培训和 service 对农村贫困妇女的可行性和持续性，并在农村社区提供完备的公共服务，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保证妇女参与培训，从而提升技能。

（三）提高贫困妇女可行性能力

要缓解贫困代际传递，应优先向贫困妇女投资，针对妇女的投资应该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她们的物质资源，二是提高她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调查发现，当前农村的贫困妇女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结构性贫困，即有能力自足，但没有机会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一类是偶发性贫困，即凭借资源能够自足，但是在灾祸面前脆弱的人（如因病因残致贫）。这两类贫困群体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有能力且有脱贫的意愿，给她们提供物质帮助固然重要，但是她们更需要社会政策支持下的发展机会和能力。因此，精准扶贫政策要瞄准贫困妇女，为她们提供劳动机会、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的创新措施，将妇女就业创业与脱贫政策结合起来，这样会使精准脱贫取得更多实效。

（四）为贫困妇女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

在针对贫困妇女的扶贫实践中，我国妇联组织和一些其它非政府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妇女小额信贷项目和“巾帼扶贫行动”是真正瞄准贫困家庭，提升贫困妇女能力的十分有效的做法。不仅为贫困妇女脱贫搭建了平台，还依托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支持系统去对接多元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增加了她们从社会政策中获取福利的能力。如今，精准扶贫中贫困村已经不缺乏关爱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民间组织，比如妇女维权站、妇女儿童活动之家等，只是多数组织没有发挥好作用，原因就是缺少将这些组织推动起来的一套运行机制。在现有的扶贫保障体系中将非政府组织的行为纳入已有的教育扶贫、卫生扶贫、文化扶贫和科技扶贫措施，使非政府组织在制度框架内有序运行。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法律宣传、技能培训、权益维护、文体活动、心理咨询、情感关爱等服务。探索建立农村妇女互助小组，努力做到生产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扶持、情感上相互依靠、安全上相互关照。

（五）针对妇女贫困调整精准扶贫机制

世界银行（2003）认为贫困是人们想逃避的一种生存状态，贫困意味着饥饿、缺医少药，失业、

无上学机会以及权利和自由的丧失^[2]。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妇女贫困问题，在政府预算中纳入性别预算，致力于缓解妇女贫困事业。从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保护妇女社会权益，增加妇女就业机会，保障妇女营养和健康等角度去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所有这些扶贫措施之所以能为缓解贫困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他们在制定政策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与之相配套的保障和运行机制。在扶贫工作机制方面，我们国家已经探索建立了符合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体系，尤其在专业扶贫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依然缺乏能够保证这些扶贫政策取得成效的运行机制。比如，在精准评估机制中将妇女减贫数量、贫困妇女增产增收、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和女童入学率情况纳入考评体系，对完不成任务的也实行“一票否决”。

（六）重视和投资农村女童教育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解决贫困的最有效办法是让女童接受教育。调查显示，一个早婚的女性将来长期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是 31%，提前辍学的女性将来生活窘迫的可能性是 11%。从代际传递角度讲，接收教育的女童成年后可能更倾向于孩子也接受教育，懂得教育对贫困者的潜在利益，并能够用心教育孩子和对孩子的学习提供帮助。考察精准扶贫中相继出台的相关教育扶贫政策，其中包括：改善贫困村办学条件、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的补贴补助、面向贫困地区的招生、就业等诸多具体优惠政策，唯独没有针对贫困家庭女童的扶助政策和制度安排。显然，政府的教育扶贫并没有特别向女童倾斜，女童失学和辍学现象还是得不到根本解决。因此，要实现精准扶贫长效机制，政府应设立女童教育专项基金，保障女童受教育权利，延长女童受教育年限，提高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有在根源上缓解妇女贫困程度，才能有效阻止贫困代际传递，农村的贫困家庭就会减少，扶贫成效会更加稳固。●

参考文献：

- [1] 沈小波 林华国. 贫困范式的演变及其理论和政策意义[J]. 经济学家, 2005 (06).
- [2] 史蒂芬·M. 博杜安. 世界历史上的贫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